

# 從中朝關係史看明清史研究的新面向 ——以《燕行錄》為中心\*

吳政緯\*\*

## 摘要

近年來隨著《燕行錄全集》等域外漢文文獻的出版，以及諸多朝鮮史料數位化工程的成熟，為中朝關係史研究注入新動力，在議題的開展與史料的採摭上均有豐碩的斬獲。本文旨在從明清史的角度審視 2000 年以來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成果，省思中朝關係史的議題與發現，能夠帶給明清史研究哪些刺激與思考。因此，本文無意全面地介紹近年來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概況，僅就「文化交流」、「華夷思想」及「書籍傳播」三方面討論。筆者認為明清史與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之間尚缺乏充分的對話，期盼藉由中朝交流史中最具成績與潛力的三種議題出發，一方面檢視近十年以來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斬獲，一方面分析做為明清史研究者，如何援引相關研究成果，深入域外文獻之林。細察此三議題的發展，如文化交流從注重國交關係到微觀文人交往，華夷思想的討論經由中朝士人間的談話，尋繹出更複雜的心態，藉由檢視中朝關係史研究的趨勢，探索明清史研究新貌。

**關鍵詞：**中朝關係史、明清史研究、《燕行錄》、文化交流史、域外漢籍

---

\* 本文係「2013 年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研究成果。初稿為 2013 年臺灣師大「歷史學研究法」課程期末報告，承蒙林麗月老師悉心指正，及兩位匿名審查人諸多建議，謹此深致謝意。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 一、前言

1938 年，胡適在瑞士介紹中國史的新材料時，提及今日人們耳熟能詳的「四大發現」，即殷墟甲骨文、居延漢簡、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檔。除上述四種外，胡適也曾提出第五種重要的史料，即藏於日本朝鮮的中國史料。<sup>1</sup>事實上，明清史的研究者對於胡適口中的漢文文獻並不陌生，1950 年代，吳相湘特別強調《朝鮮王朝實錄》對清初史事的補充，藉由朝鮮此「第三人」的角度記錄明清鼎革諸事，實為治明清史不可或缺的材料。<sup>2</sup>1960 年代著名學者吳晗即將《朝鮮王朝實錄》與中國相關的史料輯出，<sup>3</sup>至今仍受到學界重視。不僅如此，日本與越南的漢文文獻更是中國史不可或缺的參考材料，朱雲影曾將日、韓、越歷代留下的各種史書稱為「東方史料的一大寶庫」，<sup>4</sup>並認為是治中國史的重要資產，可見前輩學者對周邊國家的文獻多有關注，今日各種以「域外」為名的研究亦有跡可循。

<sup>1</sup> 王汎森輯，〈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誌》，93：3（臺北，1996.9），頁11。

<sup>2</sup> 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著，《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5），頁151-185。前輩學者如謝國楨亦稱研究明清史「只有從當時遺留下來的明清兩朝《實錄》和我們鄰邦朝鮮《李朝實錄》等書，以及當時政府所儲存的檔冊、情報、公文、閱件等史料入手。」見氏著，《明清史談叢》（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頁250。

<sup>3</sup>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此書雖出版於1980年，但最遲完成於1966年，事見翁獨健〈序〉。此後陸續有學者整理朝鮮史料與中國相關的部分，如池內宏編，《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王鍾翰輯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女真史料選編》（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9）。另外，亦有以朝鮮文人文集為中心的整理工作，見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的明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的清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sup>4</sup>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頁2。同時，朱雲影也反省這些史料沒有被充分利用：「今日那些漢文文獻，卻多被束之高閣，因為日韓越各國，已限制漢字或廢止漢字，各國青年已無法讀懂漢文，而各國學者能讀懂他們祖先著作的，恐怕也已不多，即使有相當的漢文修養，由於民族意識的作祟，也未必能做客觀的正確の利用，而西方學者限於客觀條件，似乎也很少注意及此，至於中國學者，一向漠視那些漢文文獻，當然更談不上利用那些漢文文獻做綜合的系統研究。」見頁2。

2001年，韓國學者林基中整理出版100冊的《燕行錄全集》，為此寶庫又添增一筆收藏，同時激起一股中朝關係史研究的熱潮。實際上，今日習用的「燕行錄」一詞，實囊括諸多史料，如明代的《朝天錄》、清代的《燕行錄》與《使臣別單》。<sup>5</sup>據不完全統計，朝鮮派往中國使節共607次，<sup>6</sup>此類豐富文獻出自朝鮮知識階層之手，他們來往於中朝之間的貢道上，有時肩負特殊的政治使命，有時為謝恩、奏請、進賀、問安等各種外交事務而來。中國的各種事物深深地吸引著使臣們的目光，他們有的將所見所聞整理後呈報朝廷，有的獨自書寫於日記中，這些包括圖像、日記、詩歌、別單（報告書）的文本，其總和就是《燕行錄》。臺灣學界方面，中研院近史所張存武1970年代就注意此類朝鮮史料，他不僅認為這得以補充中國史料，<sup>7</sup>更將《燕行錄》視為「研究清史及中韓關係史之珍貴資料」。<sup>8</sup>

中朝關係史研究10年來產生極大的變化，一方面得力於新材料的陸續出版，另一方面則是在學術風尚轉向之際，成功地吸引許多社群的關注。各研究機構陸續出版《燕行錄》<sup>9</sup>以及各式域外

<sup>5</sup> 這些命名上的異同，表明朝鮮對明朝（朝天）、清朝（燕行）不同的看法，不僅寓有文化正統誰屬的深意，也傳達朝鮮對自己定位的理解，相關辨析見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81（上海，2006.3），頁29-58。

<sup>6</sup> 林基中著、王永一譯，〈《燕行錄》的傳承〉，《中國邊政》，180（臺北，2009.12），頁27-38。

<sup>7</sup>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5（臺北，1967.1），頁41-42。

<sup>8</sup>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頁20。

<sup>9</sup>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2001）。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首爾：尚書院，2008）。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國大學，2008）。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1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0）。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2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2）。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3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13）。同時，大部分的《燕行錄》本就收於朝鮮文人文集中，故得以使用資料庫檢索，更顯其便利。關於韓國的資料庫建置，見河惠丁，〈韓國漢學文獻收藏及資料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30：2（臺北，2011.5），頁31-39。

漢籍，<sup>10</sup>扭轉過去材料零散、版本不一的景況，為研究者提供莫大的助益。同時，文化交流史的議題亦由「西方」與「東方」的相遇，轉為區域間的聯繫與變遷。<sup>11</sup>因此，以中文學界言之，2000年以來中朝關係史的成果，多出自明史、清史的學者之手，而非專業的朝鮮史專家，他們援引中朝相關史料，試圖以「域外之眼」重新省視過去的論述。由此觀之，現下的出版狀況已逐步將此一大寶庫挖掘出來，而中朝關係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有鑑於域外史料不斷地擴充，各種議題日益發展，本文擬梳理近十餘年來の中朝關係史研究，反思作為明清史的研究者，如何看待域外漢文文獻的價值，以及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意義。關於以《燕行錄》為中心的研究回顧，學界已有詳盡的述評，<sup>12</sup>本文僅深入幾個與明清史特別緊密的重要議題，分別就文化交流、華夷思想、書籍傳播等三方面申論，討論從明清史看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意義。

## 二、近十年來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概況

2000年以來，中朝關係史議題的翻新伴隨著新史料、新觀點的發掘而起，其中尤以「文化交流」、「華夷思想」、「書籍傳播」三個園地發展較其他面向更迅速。本文將分析近來的研究帶來哪些新的刺激與發現，如何改變過往對上述問題的理解，進而開展

<sup>10</sup> 如中國社科院與人民大學、西南師範大學共同出版《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將散逸於周邊國家的漢籍重新整理，許多流落海外的孤本得以重新回到研究者的視界中。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預計出版域外漢籍共1000種，分成數輯出版，每一輯按性質分類為「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目前出版至第3輯（2012）。此外，朝鮮官方史料如《日省錄》、《承政院日記》、《備邊司謄錄》均有許多和中國相關的記載，限於篇幅，本文僅以《燕行錄》為中心展開討論。

<sup>11</sup> 東亞為中心的討論，見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尤以第一章最為詳細。

<sup>12</sup> 尤其是裴英姬梳理中、日、韓三國1933年以來的研究史，見氏著，《〈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219-255。關於中國大陸方面《燕行錄》研究的回顧，見陳尚勝，〈近16年來中國學術界關於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述評〉，《當代韓國》，2009：3（北京，2009.9），頁80-92。王禹浪、程功、劉加明，〈近二十年中國《燕行錄》研究綜述〉，《哈爾濱學院學報》，33：11（哈爾濱，2012.11），頁1-12。

中朝關係史的新面向。

### （一）文化交流

關於近十年來中朝文化交流的研究，南開大學孫衛國、延邊大學徐東日與浙江大學楊雨蕾在拓展了文化交流研究的議題上，成果最為豐碩。孫氏深入幾個不同的交流案例，揭示中朝文人交遊的歷史意義，徐氏則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考索朝鮮知識階層眼中的明朝、清朝形象。<sup>13</sup>楊雨蕾整體性地勾勒出燕行使臣與明清士人的交往、漢籍東傳朝鮮、漢譯西書的流通幾個議題的輪廓，並製作數個極具史料價值的總表提供參考，是《燕行錄》研究的重要作品。<sup>14</sup>以下，試從明清史的角度析論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面向。

文化交流始終是中朝關係史的熱門話題，其中包括朝鮮使者的中國見聞和中國使臣的著述。目前的研究情況著重在清代的中朝交流，一方面清代的朝鮮使節較無館禁的限制，得以肆意遊觀；<sup>15</sup>另一方面，清代的漢文文獻保存較為完整，資料遠比明代豐富，自然為學界所關注。<sup>16</sup>然而，儘管明代使節在京師較缺乏機會，但仍藉由各種管道，積極地與中國士人、外國使臣來往。臺灣師大張崑將注意到萬曆二年（1574）的使臣許篈（1551-1588），在前往北京的使行路上不停地詢問中國士人「陽明學」是否為正統，以及王陽明入祀的問題。是年，明朝的官員亦正為著陽明入祀與否爭執不休，<sup>17</sup>許篈作為堅守朱子學的朝鮮士大夫，發現部分

<sup>13</sup>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sup>14</sup>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sup>15</sup> 清代朝鮮人洪大容於1765-1766年間在中國的經驗適足以說明此況：「貢使入燕，自皇明時已有門禁，不得擅出遊觀，為使者呈文以請或許之，終不能無間也。清主中國以來，弭兵屬耳，恫疑未已，禁之益嚴。至康熙末年，天下已安，謂東方不足憂，禁防少解，然遊觀猶托汲水行，無敢公然出入也。數十年以來，昇平已久，法令漸疎，出入者幾無間也。」見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錄全集》42，首爾：東國大學，2001，頁60。

<sup>16</sup> 以《燕行錄全集》為例，100冊中僅20冊屬明代文獻。

<sup>17</sup> 相關討論見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楊聯

中國儒生居然信奉王學，甚至支持入祀文廟之事。<sup>18</sup>藉由許筠與多位中國士人之間的辯論，得以審視一群名不見經傳的中國儒生，觀察他們如何看待王學、朱學之間的異同。這不僅反映朝鮮人如何理解中朝之間的學術差異，也從朝鮮使節的筆下，尋覓出更豐富的中國聲音。

《燕行錄》的特色不僅是保存中國史料，例如許筠對中國宮殿的形制、路旁匾額、碑石的內容，甚至邸報以及各種奏本都極力抄錄。更重要的是，《燕行錄》為我們找到過往研究中失卻的聲音，他們可能是趕路回家的舉人、居鄉苦讀的秀才，或是生活於北京的國子監生。<sup>19</sup>京都大學夫馬進即特別留意趙憲（1544-1592）、許筠對於中國情況的報告，藉由他們在國子監參訪的經歷，以及頻繁地與驛臣、百姓交流，發現朝鮮使節對明朝直接的批判。<sup>20</sup>朝鮮使臣與不同層級的中國人交流，一方面提供我們來自朝鮮的「中國情報」，另一方面也為我們拓展中國士人的不同面向。夫馬進深入清初使節閔鼎重（1628-1692）的日記，發現他與中國北方小城鎮士人王秀才的交談極具意義。王秀才對於諸多時事如安南國來朝、永曆帝、李定國的情況、鄭經以及臺灣問題都有基本且正確的瞭解。<sup>21</sup>儘管夫馬進強調的是朝鮮人訪求而得的情報，往後逐漸成為朝鮮方面的「常識」，但是，藉由王秀才的案例，也為我們展示一個普通士人的日常生活。

明代朝鮮使節不僅熱切地尋求與中國士人交往的機會，更藉各國使臣齊聚一堂的盛會，與他國之間互通聲息。明清時代的北

---

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下冊，頁567-581。

<sup>18</sup> 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辯及其意義——以許筠與袁黃為中心〉，《臺大文史哲學報》，70（臺北，2009.5），頁55-84。

<sup>19</sup> 筆者注意到許筠日記保存不少有趣的記錄，例如一位隆慶元年恩貢生趙鶚與許筠的對談，展現出恩貢生對於明朝政治獨到的見解，見許筠，《朝天記》，《燕行錄全集》，冊6，頁308-311。

<sup>20</sup> 夫馬進著，伍躍譯，〈萬曆二年朝鮮使節對「中華」國的批判〉，《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21。

<sup>21</sup> 夫馬進，〈閔鼎重《燕行日記》中收錄的《王秀才問答》〉，《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頁32-46。

京正是東亞各國交流的舞台，使節們藉此互相打探情報。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萬曆二十五年（1597）出使明朝的李晬光（1563-1628），他駐留北京時與安南使臣馮克寬、琉球使臣蔡堅來往密切，雙方詩文唱酬不斷，甚至留下珍貴的筆談記錄。<sup>22</sup>雲南紅河學院的陸小燕、葉少飛藉由朝鮮、安南使臣之間的問答記錄，分析雙方在和詩中的交鋒，及其詩文表面的和諧；李晬光希望藉此宣揚朝鮮「禮義之邦」的形象，馮克寬則期盼這些詩文能夠證明安南得到朝鮮國的肯定與支持。<sup>23</sup>朝鮮、安南的使節各自肩負政治使命，互相唱酬和詩僅是交流的一個面向，企圖瞭解中國與鄰國的情況、蒐集情報同是不可遺忘的任務。延續至清代，朝鮮使節仍在北京收集各國情資，關心鄰國的貢期、貢路、貢物及該國之風俗、歷史、刑罰等制度。<sup>24</sup>

相較於明代的中朝關係，清代《燕行錄》引發的議題更為多元，尤其是關於清中葉士人交往的研究。明清鼎革，朝鮮知識階層對清朝普遍持負面觀感，將滿洲視為「胡虜」，伊始不樂於與「剃頭舉子」<sup>25</sup>結交。臺灣大學裴英姬的碩士論文將中朝士人交往的開展追溯自金昌業（1658-1721），他與清代的譯官、士人、官員、和尚相對客觀地交流，<sup>26</sup>為後來朝鮮使節的交遊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sup>27</sup>金昌業交往的對象，多為文化水準有限的士人，甚至是販夫走卒之流。爾後，隨著中朝之間的交往愈密切，不僅雙方

<sup>22</sup> 李晬光的《南使臣贈答錄》、《琉球臣贈答錄》收入《燕行錄全集》，冊10。

<sup>23</sup> 陸小燕、葉少飛，〈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域外漢籍研究集刊》，9（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95-420。

<sup>24</sup>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29：3（臺北，2011.9），頁155-190。沈玉慧，〈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50（臺北，2012.12），頁109-153。

<sup>25</sup> 此為金鍾厚（1721-1780）語，見金鍾厚，〈答洪德保〉，《本庵集》，卷3，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237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頁380。

<sup>26</sup> 裴英姬，〈十八世紀中朝文人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sup>27</sup> 朝鮮使節的《燕行錄》在朝鮮內部傳閱，例如許筠行前就讀過崔溥（1454-1504）的《漂海錄》，洪大容也熟悉金昌業的《老稼齋燕行日記》。許筠曾要求朝鮮地方官員印《漂海錄》，見《朝天記》，頁65。洪大容的日記中也透露他瞭解金昌業的燕行，見《湛軒燕記》，頁62。

結交的層次更高，交流的話題也更為深入多元。一個著名的案例是 1765 年前往北京的洪大容（1731-1783），他與三位來自杭州的舉子筆談，結為生死之交，在朝鮮甚為知名。孫衛國梳理了雙方交往的歷次時地，並指出洪大容與中國儒生就朱熹詩注、王學評價、明朝情感皆有深入的交流，而此豐富的記載，正得自於他們真摯的交往。<sup>28</sup>孫氏的研究指出，洪大容在中國的故事深深影響後來的朝鮮使節，為清代中朝關係的發展提供正面力量。同時，藉由雙方筆談的記錄，我們也得以審視中國儒生有關科舉、貞節、佛道、基督教的想法。

貫通明清兩代，朝鮮使節一直關注王學的傳播與發展，他們以嚴肅堅定的立場「衛朱斥王」，儼然以儒學正統自居，將陽明心學視為異端邪說。夫馬進認為清代朝鮮人較同時的日本人、中國人更為理性與嚴肅，中國與日本士人顯得動情傷感。例如洪大容與中國友人離別時，中國儒生居然感傷落淚，令朝鮮人驚訝不解。夫馬進將此歸因於朱子學的影響，認為朝鮮士人熟習朱子學而顯得克制，中國儒生則受心學影響，被視為「多情」。<sup>29</sup>清代朝鮮人的言說與態度，比起中國士人似乎更像是「中華國」<sup>30</sup>的子民。王振忠的研究則提醒我們：對於東亞各國而言，「中國」始終是東亞鄰國不可或缺的重要參照，凡是與中華文明相符的即歸於「雅」，而本國的則視為「俗」。<sup>31</sup>因此，清代朝鮮人認為自身保存明代文化，無論學術或宗教都將清代視為「多情」，歸諸「異

<sup>28</sup> 孫衛國，〈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以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交往為中心〉，《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頁157-187。

<sup>29</sup> 夫馬進，〈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與1764年朝鮮通信使——以兩者在中國和日本對「情」的體驗為中心〉，《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頁158-185。

<sup>30</sup> 「中華國」為夫馬進的用語，見氏著，《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頁3。

<sup>31</sup> 王振忠，〈18世紀東亞海域國際交流中的風俗紀錄——兼論日、朝盛清時代中國的重新定位及其社會反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合肥，2010.8），頁1-16。此外，李爽學關於晚明傳教士的研究，也注意到「中國」、「文言文」在16-17世紀的重要地位，這不僅展現文言文極廣的流通性，也凸顯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知識世界，見氏著，《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21-23。

端」，即非不可理解之事。

朝鮮使節在中國的樣貌不僅止於學術上的交流，葛兆光即由朝鮮使臣在北京與西洋傳教士的交往，觀察中朝交流的另一面向。這些好奇西洋事物的朝鮮人，頻繁地前往北京天主堂求見欽天監，請教天文地理以及基督宗教。漸漸的，朝鮮使者從充滿好奇到逐漸疏離，傳教士的吸引力不再，但漢譯西書等學問也伴隨著文化交流進入朝鮮境內。<sup>32</sup>香港浸會大學羅樂然的個案研究則是關注洪大容的中國經驗，洪大容在北京與欽天監之間的問題是少數西洋傳教士留下的文獻，而洪氏參訪天主堂、交流天文知識，一方面意味著朝鮮人對西洋的認識只有透過北京方能達成，一方面也象徵明清北京作為東亞中心的歷史意義。<sup>33</sup>同時，羅氏並以《燕行錄》反向操作，藉此呈現乾隆禁教時期西洋傳教士的積極形象，他們致力維持傳教工作，甚至暗中消解幾次教案。<sup>34</sup>

此外，中國官方因應藩屬國各類事務，如冊封國王、世子，或傳達旨意，亦會遣使朝鮮。<sup>35</sup>近年有關中國遣使朝鮮的研究集中於明代，尤其是以《皇華集》、《使朝鮮錄》為中心的討論。《皇華集》是明代文臣、朝鮮接待使臣之間唱酬詩文的總匯，用以紀念明鮮關係的友好。<sup>36</sup>《使朝鮮錄》則是一種總稱，指中國歷代官員出使朝鮮的各式記錄。<sup>37</sup>北京大學的曹婷婷是最早整體性地分析《皇華集》者，她指出明朝文臣特別留意「箕子廟」、「宣聖廟」、「孝女廟」三地，往往駐留於此，賦詩作對，宣揚朝鮮受聖化之

<sup>32</sup> 葛兆光，〈鄰居家裡的陌生人——清中葉朝鮮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傳教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北京，2006.6），頁1-11。

<sup>33</sup>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1（臺北，2013.6），頁299-345。

<sup>34</sup> 羅樂然，〈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中國史研究》，82（大邱，2013.2），頁93-114。

<sup>35</sup> 李新峰，〈明前期赴朝鮮使臣叢考〉，《明清論叢》，4（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91-104。

<sup>36</sup> 現《皇華集》已有點校本，且附上439頁的參考資料，包含所有詩人的小傳、使行路線以及相應時間中《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見趙季輯校，《足本皇華集》（北京：鳳凰出版社，2013）。

<sup>37</sup> 「使朝鮮錄」是中國使臣到高麗、朝鮮沿途紀載的總稱，見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教，是文獻之邦。<sup>38</sup>儘管《皇華集》多為詩文，但曹氏的研究仍闡釋明朝文化對朝鮮的影響，「從明朝看朝鮮」，反省研究現況過於集中「從朝鮮看明朝」的傾向。同時，杜慧月利用《朝鮮王朝實錄》互文閱讀《皇華集》，發掘出中朝臣子應和詩文的表象下，實是滿佈猜忌，時生嫌隙。<sup>39</sup>此外，南洋理工大學衣若芬則關心明使在朝鮮時所賦的「卻妓詩」，肇因朝鮮官方習以「女樂」招待明使，但明使屢屢婉拒，引發朝鮮內部是否「廢女樂」的爭議，不妨視為朝鮮內部在文化上跟隨明朝或堅持本土的「路線之爭」。<sup>40</sup>衣氏為以《皇華集》為中心文本的討論另闢蹊徑，更細緻地探索明朝使臣、明朝文化對朝鮮的影響。中研院文哲所廖肇亨的研究也指出明朝使節出使朝鮮，不論在文學史或文化交流史上，蘊含著他們的新的書寫範式與世界觀，尚待更多學人投入。<sup>41</sup>

文化交流議題近年來仍著重於清代，但漸有以明代為中心的材料為學界所關注，進而延伸出專屬明代的中朝關係史研究。文化交流作為中朝關係史研究的主流，儘管仍以文人交往為大宗，但相較於過去旨在廓清史實，近年的研究更注意相互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藉由朝鮮這個參照系統，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反求諸己，不僅檢視從朝鮮看中國的歷史意義，更在複雜的中國史圖像中，開發新議題。

## （二）華夷思想

朝鮮受明名命，又在朝鮮之役（1592-1598）中「復其八道」，使之無國而有國，往後兩百年朝鮮始終感佩在心。及至滿洲入主中原，朝鮮仍心向大明，認為清朝「外似昇平，內實蠱

<sup>38</sup> 曹婷婷，〈《皇華集》——中朝文化交往的歷史見證〉，《韓國學論文集》，12（北京，2004），頁25-40。

<sup>39</sup> 杜慧月，〈歷史鏡像中的《皇華集》詩歌——《李朝實錄》、《皇華集》互文閱讀〉，《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頁236-271。

<sup>40</sup> 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出使朝鮮文臣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北京：中華書局，2010.5），頁91-113。

<sup>41</sup> 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藩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29：2（臺北，2011.6），頁53-80。

壞，……，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sup>42</sup>抱定「強虜從無百年運」的想法。事實上，明清史學界對朝鮮的華夷觀早有關注，上個世紀張存武與南開大學馮爾康對此都有所論述。張氏將朝鮮此種尊明態度稱之為「尊周攘夷」，<sup>43</sup>馮氏則將這種緬懷明朝恩德，仇恨清朝的思想名之為「尊明反清」，皆著眼於「反清」的一面。<sup>44</sup>此後，直至2007年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97-1800）》<sup>45</sup>一書的出版，可視為華夷思想議題的集大成之作。孫氏認為「尊周思明」方能完整地表述朝鮮特殊的文化認同，尊周即尊王，尊王即攘夷；思明即反清，反清即復明，<sup>46</sup>朝鮮對清廷的不認同必須衡量慕華事大的因素，也須同時檢驗他們尊明貶清的理論基礎，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條件。

孫衛國從思明問題的視野切入傳統的「華夷議題」，他的討論範疇不僅囊括朝鮮官方、一般士人、明朝遺民，更使諸多空間與物質成為意義非凡的象徵。例如原本在明代不重要的空間，也會因為保有與明朝之間的連結，在清朝頓顯文化深意。<sup>47</sup>但是，美國學者金載炫（JaHyun Kim Haboush）從政治關係觀察朝鮮內部對明朝的討論，提醒我們在處理朝鮮的思明問題時，不僅可以做為文化認同的命題，也可理解為政治問題。<sup>48</sup>因此，如何審慎地選擇

<sup>42</sup>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冊43，頁117。英祖58卷，19年10月27日丙子條。

<sup>43</sup> 張存武，〈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59。張存武此長文是研究清代中朝關係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及的各種議題至今仍值得再三推敲。

<sup>44</sup> 馮爾康，〈朝鮮大報壇述論——中朝關係和中國文化傳播的一個側面研究〉，《韓國學報》，10（臺北，1991.5），頁121-143。

<sup>45</sup>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sup>46</sup> 如孫氏關於《尊周彙編》一書的討論，即把朝鮮修史書的行為理解為「尊周意在尊明，尊明旨在反清，從而表明朝鮮承繼了明朝以來的中華正統。」見氏著，《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353。

<sup>47</sup> 最能說明此的是關於朝鮮「關王廟」的研究，朝鮮的關王廟在明代甚沒落，但卻在清代成為明朝文化的象徵，見孫衛國，〈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之演變〉，《東疆學刊》，27：2（延吉，2010.4），頁1-13。

<sup>48</sup> JaHyun Kim Haboush（金載炫），“Contesting Chinese Time, Nationalizing Temporal Space: Temporal Inscription in Late Korea,” Lynn A. Struve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研究對象，實為探討思明議題、華夷思想的要件之一。葛兆光一系列的研究即注意到一群離政治中心較遠的群體，也就是隨朝鮮使節團到清朝的隨行士人。他以燕行文獻為基礎的研究，呈現一般朝鮮士人在明清易代後的兩百年，如何思念明朝。例如朝鮮使節編造一個關於中國婦女季文蘭的故事，述說這位淒苦女性在明清之際的悲痛，<sup>49</sup>儘管故事的真實基礎薄弱，但仍撥動無數朝鮮士人內心的明朝情結。

葛兆光筆下的朝鮮士人不僅在鼎革後藉由季文蘭的故事「自我言說」，葛氏更指出這些朝鮮人身著大明衣冠，來往於中朝間的貢道上，周遊於北京的巷弄間，頻頻於日記與言談間自問：「大明衣冠今何在？」朝鮮使節對漢衣冠的堅持與對清代漢人的質問，一方面表明自己看待清朝正統的立場，一方面彰顯中朝雙方對於「明朝」記憶的漸行漸遠。<sup>50</sup>葛兆光的研究關注朝鮮使臣對明朝故事的理解與詮釋、明代文物的流傳與使用，另一顯著例子是街頭上穿戴著明衣冠的戲子。戲台上的伶優是清代少數得以身穿前朝服飾的職業，當朝鮮使者在中國發現這特殊的活動時，他們並不將此視為純粹的娛樂事業，而更傾向將此歸諸文化的保存工作，因為得以「復見漢官威儀」。<sup>51</sup>清代朝鮮知識階層對「明朝」的執著與認同，反映朝鮮如何安排自己的定位，以面對「夷狄入中國」的新局。不論是孫氏關於朝鮮內部思明議論的討論，或葛氏筆下朝鮮使節對明朝文化的執念，皆從不同面相呈現因華夷思想而迭出的認同實踐。

轉移目光於北京的朝堂上，更凸顯朝鮮對明朝文化的堅持，

---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 2005), pp. 115-141.

<sup>49</sup> 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題詩的兩百年遐想〉，《中國文化》，22（北京，2006.5），頁138-145。

<sup>50</sup>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10（開封，2005.10），頁41-48。

<sup>51</sup>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1（北京，2010.1），頁84-92。

一如王振忠所說：「中國始終是東亞鄰國不可或缺的重要參照」，藉由朝鮮對清朝的各種敘述，我們一方面衡量明清鼎革對鄰國的影響，一方面也可尋繹出清代漢人對明朝的思念。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1735-1796 在位）於熱河召開八十大壽的盛宴，東亞各國使節雲集，當安南國王改易服色後，在場的琉球、朝鮮使節對此的反應，透露的不止是驚訝，更多的是一種鄙夷。葛兆光指出這在不斷強調身著「漢衣冠」的朝鮮士人面前，安南的改服無異於在這場「文化的比賽」中敗北。<sup>52</sup>顯而易見的是，朝鮮對明朝文化的認同，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如何定位自己，同時也決定「他者」在清代的文化地位。因此，朝鮮使者筆下的「山海關」在清代成為華夷界線的象徵，不復是單純的地理名詞，<sup>53</sup>即使仍有如金昌業、洪大容、李基憲等較持正面態度的朝鮮使節，<sup>54</sup>但明清鼎革以來的朝鮮人仍是在尊周思明的大背景下，蒐羅明遺民的文集，挖掘遺民故事，為我們保留各式明遺民文本。

將焦點置於使行路上的朝鮮使節，更容易發現他們眼中的「文化」在明清之際的轉變，朝鮮對清朝的批判更多的是一種文化評論，這從日記名稱的變化即可見其端倪。孫衛國與葛兆光都深入分析從「朝天」到「燕行」的巨大變化，<sup>55</sup>葛兆光認為朝鮮使者將前往中國稱為「燕行」，傳達著否認清中國作為「天朝」正當性的深意。誠然，朝鮮士人眼中的清代學術可謂邪說當道，不復為朱子正脈，因為禮儀不用朱子家禮，國子監生不坐監聽講，孔廟的庭院蔓草遍布，而四處走動輒見淫祠、淫寺，當真是「明朝後無中國」。因此，葛兆光不停追問17世紀後「東亞」是否存在的疑惑，正是從中朝交流過程中得到的結果，清代以後的東亞雖然

<sup>52</sup>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上海，2012.4），頁1-11。

<sup>53</sup> 黃普基，〈從「遼燕舊界」到「華夷大界」——朝鮮人筆下的山海關意象〉，《清史研究》，2012：4（北京，2012.11），頁28-36。

<sup>54</sup> 譚妮如，〈李基憲《燕行錄》中之清代中國形象〉，《漢學研究集刊》，12（斗六，2011.6），頁133-164。

<sup>55</sup>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1（北京，2002.3），頁74-80。

交通條件改善不少，但無法改變明亡後「地漸進而心漸遠」的歷史發展。<sup>56</sup>

朝鮮使節因華夷思想而起的種種言說與行爲，或許類似明遺民的景況，唯其不受清朝官方的文字監察，亦能身著明衣冠，嚴守朱子學，來往於北京內外。朝鮮士大夫驕傲地聲稱「刑制從《大明律》，喪制從《朱子家禮》，冠裳遵華制」，<sup>57</sup>看似在清代並沒有受到影響。因此，藉由此類揣著思明之心的異域之眼，我們得以更細微地體察漢人對清朝統治的肆應。

### (三) 書籍傳播

中國歷代賜書藩屬邦國，旨在宣播文教，賓服外夷。就中朝之間的圖書交流而言，固然有官方往來的一面，但藉由《燕行錄》及各類域外漢籍的問世，使得深入民間書籍流通的議題成爲可能，更凸顯從書籍傳播的角度審視文化交流的意義。楊雨蕾〈燕行使臣和漢籍東傳〉一文以《燕行錄全集》爲基礎，考察各種圖書傳播的類型與北京的書籍市場「琉璃廠」的建置，諸如中國朝廷的賜書、使臣私自求購與受贈書籍、清代禁燬書的傳入以及中朝士人之間的書緣，皆有所著墨。<sup>58</sup>朝鮮士人鍾情於中華文化，藉燕行的各種機會索購書籍，扮演中朝書籍交流的重要角色。楊氏就不同類型的圖書傳播分析，探討朝鮮士人關心哪些書籍，及這些書籍造成甚麼影響。值得一提的是，楊雨蕾注意到朝鮮士人「所涉獵的中國書籍門類相當全面」，當時朝鮮人對於中國圖書的掌握不可忽視。此外，她利用《燕行錄全集》整理而成的「傳入朝鮮清代禁燬書籍一覽表」，不僅得以發現朝鮮知識階層對

<sup>56</sup>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頁29-58。葛兆光，〈西方與東方，或者東方與東方——清代中葉朝鮮與日本對中國的觀感〉，《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153-170。

<sup>57</sup> 此為崔溥於中國應答官員之語，見氏著，《錦南漂海錄》，《燕行錄全集》，冊1，頁384。

<sup>58</sup> 楊雨蕾此文為數篇專題論文擴充而成，見氏著，〈燕行使臣和漢籍東傳〉，《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頁107-158。此外，就筆者管見，最早藉《燕行錄》整理中國典籍的學者是張存武，見張存武，〈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頁320-326。

於「禁書」極力索求，也映照出清代禁燬圖書的背景下，敏感文書仍得以於北京流通的一面。

孫衛國也注意到中國書籍在朝鮮的流通情形，他更著重於史書、禁燬書對朝鮮的影響，例如清修《明史》刺激朝鮮國內一股纂輯明代歷史的風氣。又如《明實錄》、《明紀輯略》等關涉明代史事的書籍東傳，造成朝鮮國內討論「明史知識」的氣象。<sup>59</sup>更重要的是朝鮮的「反應」，朝鮮面對清代官方大規模的修史工程，爲了維護、鞏固其自我認知的「明朝故事」，上從國王，下至草野，皆著力於撰述明代歷史，藉由孫氏整理的「朝鮮尊周類史書狀況表」即可見一斑。<sup>60</sup>然而，禁書僅是書籍傳播的面向之一，明清鼎革後，朝鮮士人在北京蒐求各類禁書，不妨置於華夷思想的脈絡下理解。<sup>61</sup>

倘若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詮釋，則朝鮮知識階層在中國的各種書籍經驗，也爲我們提供一道深入中國社會史的門徑。王振忠以 18 世紀中葉琉璃廠爲中心的討論，即是從中國社會史出發的考察。他發現朝鮮使節頻繁地光顧北京琉璃廠，即當時北京最具規模的書肆與古玩市場，同時也是中朝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他們不僅在此與中國士人交遊，締結不少書緣佳話，更重要的是，朝鮮使臣於琉璃廠所抄錄的書目，未見於其他中國史籍，對於研究清代書籍史或中朝圖書傳播，具有重要的價值。中國的書肆上擺放那些書籍，清代士人有哪些購書選擇，書商又有甚麼販賣策略，《燕行錄》中綿延百年的紀錄爲我們提供了以琉璃廠爲中心探討中國書籍史的可能。同時，藉由中朝士人之間的「書緣」，亦勾

<sup>59</sup>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sup>60</sup>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339。

<sup>61</sup> 必須指出的是，根據《學政全書》、《辦理四庫全書檔案》、《禁書總目》等書籍禁例，清朝不同時期的「禁書」所指涉者實不盡相同。王汎森的研究亦強調始終未有完整的禁書目錄刊行，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393-500。本文所言的禁書，係針對具載反清、思明、明末清初史事的文本。

畫中國圖書流通圖像的線索。如清代燕行使柳得恭（1748-?）曾詢問紀昀（1724-1805）《白田雜著》一書，紀昀表示已託江南刷印，可見琉璃廠與江南各地存在著圖書傳播的網絡。<sup>62</sup>

將目光聚焦於明清中國，中朝之間的圖書傳播不僅得以作為考察文人交流之資，辨析華夷思想之據，而且是深入中國書籍和古玩流動、書籍文化史的一種方法。近來王汎森關於清代禁書的研究，指出清代士人自發地用各種方式隱蔽書籍，稱之為「文獻的自我壓抑」。<sup>63</sup>上述如楊雨蕾、王振忠的相關研究，皆指出即使是清代查繳禁書的高峰時期，北京城中仍不乏書商販賣此類「違礙」書籍，為數不少的禁書仍經由不同管道東傳，朝鮮的記錄更充實我們對清代禁書情況的瞭解。

《燕行錄》為琉璃廠與清代書籍交流史保留了重要的資產，朝鮮知識階層對中國書籍的著迷，亦留存許多圖書的寶貴訊息。北京師範大學張升長期關注「四庫學」，他利用朝鮮士人對《四庫全書》各種情報的搜羅，整理出纂修館員的資訊與四庫的編修情況。<sup>64</sup>從《燕行錄》看中國的書籍史，重建圖書流通的網絡乃較長遠的目標，費時甚久，但經由朝鮮士人的目光整理散佚的書目則不失為可行的辦法。目前關於朝鮮時代所掌握的書目資訊，朝鮮王室的藏書可考諸《奎章總目》，至於朝鮮民間的收藏，學界則較

<sup>62</sup>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18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22（上海，2010.12），頁60-85。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18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下）〉，《韓國研究論叢》，24（上海，2012.8），頁340-357。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與18世紀北京的琉璃廠〉，《安徽史學》，2011：5（合肥，2011.9），頁13-29、116。此外，葛兆光也注意到清代江南與北京之間應當存在一個士人流動的路線，見葛兆光，〈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1（北京，2012.3），頁8-22。亦載氏著，《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143-180。

<sup>63</sup>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393-500。必須指出的是，王汎森也注意到《燕行錄》與禁書之間的關係，唯沒有深入的分析，見氏著，〈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628。

<sup>64</sup> 張升，〈朝鮮文獻與四庫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07：1（成都，2007.2），頁182-189。

著眼於文學著作，如高麗大學崔溶澈系統性地整理明代小說在韓國的收藏，尤其是遺佚於中國或特殊版本的小說。<sup>65</sup>值得慶幸的是，《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出版以來，無疑為學界提供一份朝鮮讀書人的藏書目錄，在書籍流通範圍上，畫出一份專屬朝鮮的知識地圖。朝鮮士人看哪些中國書，又有哪些圖書以朝鮮刻本的方式流傳，從《域外漢籍珍本文庫》能略窺一二。<sup>66</sup>

中朝圖書相互傳播的議題，伴隨著研究文人交流而起，省思近幾年以琉璃廠為中心的討論，堪稱是書籍史的專屬場域。不同於學者多關注於考證琉璃廠的歷史，及其建置上的種種細節，楊雨蕾與王振忠是少數從書籍文化史的角度探討圖書議題者，他們強調「書籍傳播—文化交流」之間的聯繫，開闢一條新的取徑，連結起明清史、朝鮮史研究者各自對書籍史的關心。王振忠指出清代琉璃廠是東亞書籍的貿易中心，並援引19世紀的地方志佐證，相較於前述文化交流、華夷思想，以物為中心的討論更凸顯「東亞」架構的歷史意義。不過，清代以來的書籍市場如何形成，並發揮何種影響力，仍待學者從琉璃廠的生命歷程勾勒中朝書籍的傳播景況。

### 三、問題與討論：明清史研究視野的拓展

#### （一）從「國交關係」到「文化交流」

學界關注國際交流並不是近幾年的學術創新，過去以「交通史」為名的取徑正是晚近文化交流史的先驅。回顧近十年來中朝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議題發展的方向不再是如交通史從官方的視角探討國交關係，相較之下，個案性地考察文人交往及從使節的視野探索中朝關係，已躍居主流。誠然，這得力於一系列《燕行錄》的出版，以及前輩學者關於中朝關係中諸多制度、政治議題

<sup>65</sup> 崔溶澈，〈韓國所藏明代小說的概況及其特徵〉，《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11），頁277-286。

<sup>66</sup> 如《肅松錄》在中國是鮮見的文本，藉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得以考察此書的使用與流傳。見《續明史》，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2輯，冊2（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13-14。

的討論，<sup>67</sup>但與當前文化史、區域交流史研究的流行也不無關係。借重文化史的分析方式，如夫馬進、葛兆光的研究皆打破過去將「明朝—朝鮮」視為一段和諧美好的藩屬佳話，這是過去從《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等進行制度性考察較難發掘之處。同時，《皇華集》的研究亦為我們發掘朝鮮主體性的聲音，以及明鮮關係的罅隙，在在傳達中朝關係的複雜性。過去僅以清代朝鮮人諸多懷念明朝的言論下斷語，不免失之偏頗。

《燕行錄》研究偏重清代，這種不平衡的情況近來稍有改變，但清代的材料更為豐富，未來尤其是清中葉為主的研究仍是中朝關係的重心。然而，上述的研究已揭示「從清代看明代」的問題，開展明代中朝關係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視。就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新面向而言，充實過往中朝關係單調的論述，呈現雙方拉鋸、競爭的文化心態，實為一大突破。但是，從明清史的立場觀之，則此新面向應不僅止於中朝關係史內部的討論，而宜反思「做為明清史的中朝關係史研究」有何意義。以臺灣學界為例，如廖肇亨使用明代《燕行錄》、《皇華集》析論的作品實不多見，而關注朝鮮漢籍或《燕行錄》的學人如張崑將也多由「儒學史」入手，前者從文學出發，後者則將此置於儒學史的脈絡中。<sup>68</sup>簡言之，《燕行錄》或域外漢籍等「東方一大寶庫」，對於明清史學者而言，尚未普遍納入研究的視界中。事實上，史學著作伴隨著新觀點、新材料而來，史家不斷擴充資料以獲新見，《燕行錄》之於明清史家，自是擴充視野的首選之一。500餘種的《燕行錄》就清代部分言之，雖然已有豐碩的成果，但焦點仍聚集在朴趾源

<sup>67</sup> 例如葉泉宏著墨於「明朝——朝鮮」之間各種政治合作，張存武則從朝貢體系的角度探討清鮮關係，皆為中朝關係史的重要參考著作。見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sup>68</sup> 如臺灣大學的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以及東亞儒學研究計畫，不僅發行刊物《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更出版諸多專書，是臺灣少數推動東亞研究的研究單位。關於臺灣大學發展「東亞儒學」，近來臺灣大學歷史系的甘懷真對此亦有討論，見氏著，〈從儒學在東亞到東亞儒學：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省思〉，《東亞觀念史集刊》，1（臺北，2011.12），頁381-400。

(1737-1805)、洪大容、朴齊家(1750-1815)等著名的朝鮮士人身上，尚有不少值得一讀的作品未及深入研究。推而廣之，100餘種的明代《燕行錄》，尤其是萬曆年間如許筠卷帙浩繁的《荷谷朝天記》，學界尚未給予充分的關注，其中仍不乏有趣的議題值得明清史學者進一步探討。

## (二) 從域外之眼思索「遺民」

華夷思想方面，孫衛國突破性的著作《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全面性地考察1637年以後，朝鮮的不同群體如何面對明清鼎革的變局，安排自己的位置。孫氏的討論雖有時仍借重朝貢體系來分析中朝交往，究其實，乃是從思想文化的面向詮釋朝鮮王朝對清朝的心態，解決一個東亞史多年未解的難題。不過，其研究愈深入朝鮮內部，尤其是朝鮮王朝的政治生態，則操作上亦愈趨複雜。孫氏認為朝鮮仁祖(1623-1649在位)對於臣子書寫清朝年號採取不同的態度，有時容忍倚重，有時卻加以懲處，反映其矛盾的心態。<sup>69</sup>書中所舉的幾個例子，官員們係來自於不同家族，且不同品階的官員，如「光州牧使宋國澤、全羅兵使黃緝」、「金尙善侄金光炫、領中樞府事李敬輿」，正如其指稱的：「政敵之間借是否用清正朔加以傾軋」，<sup>70</sup>顯見以朝堂案例分析思明問題的侷限性。事實上，金載炫較孫氏更早的研究已經指出，朝鮮官方與士林之間對於「尊明」與否存在緊張性，誰先尊明以及如何尊明，毋寧是爭奪歷史解釋權的戰爭。金氏將朝鮮官方與士林的思明行為視為一種競爭，如宋時烈及其門生在地方興建廟宇，祭祀明朝皇帝，其實也象徵他們承繼某種文化資產。<sup>71</sup>金載炫從政治關係出發的觀察，朝鮮仁祖對臣子書寫清朝年號的反覆實為合情合理的判斷，而非一種矛盾的心態。

事實上，孫衛國的研究在歸類上更傾向於朝鮮史，而非中朝

<sup>69</sup>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235。

<sup>70</sup>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頁235。

<sup>71</sup> JaHyun Kim Haboush, "Contesting Chinese Time, Nationalizing Temporal Space: Temporal Inscription in Late Korea," pp. 115-141.

關係史或明清史。孫氏與金氏關於尊周思明不同的見解，不妨視為從不同角度切入所導致的差異，對明清史研究來說，或許也僅止於朝鮮史「圈內人的討論」。但是，孫氏的作品卻可能是明清史的重要借鑑，尤其就推進明遺民研究的議題而言，朝鮮這群彷彿生於「域外」的「遺民」不啻為一重要的參照。孫衛國、葛兆光筆下的朝鮮使節在中國關心的事物如衣冠服制、遺民文集、場戲幻術、學術禮儀，無一不是明遺民關注的話題。中朝關係史研究關切的是朝鮮與中國的互動，觀察朝鮮使臣如何應對與問答，如何看待中國和審視自我。但是，迴盪於你來我往的筆談間，朝鮮的「他者」不論是國子監生或翰林學士，都不失為觀察一般士人思想的重要機會。洪大容曾與一位中國儒生鄧汶軒交談，他刻意地詢問「此中剃頭之法亦好否？」一開始鄧生還說：「自幼習以為常，頗覺其便。」最後鄧生道出「威嚴咫尺，休為此言」一語，<sup>72</sup>希望洪大容不再追問，這段對話所透露的心態對於明遺民或清代統治術研究而言，皆不失為重要的參據。

既然清朝的文化不如明朝，則朝鮮使節的中國旅行，無異於一場「緬懷明朝」的盛大演出，他們一路上身著大明衣冠，沿途關注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在日記中不時自問「大明衣冠今何在？」朝鮮士人洪大容與中國儒生筆談時，還特意提起一件在朝鮮流傳的故事：「十年前關東一知縣遇東使，引入內堂，借著帽帶，與其妻相對即泣，東國至今傳而悲之。」<sup>73</sup>朝鮮人的記述提醒著我們，乾隆年間的朝鮮人仍在清中國裡尋覓明朝的蹤跡，他們熱切地訴說明朝故事，希望喚起中國人的情緒。文化交會之間，中國儒生或因為朝鮮士人的衣著而喚起明朝記憶，但也可能因為遺忘而誤解為是「箕子遺制」。<sup>74</sup>不論如何，朝鮮使節熱衷於記錄時人對服儀的反應，也自豪地表露「得保衣冠」的驕傲，正顯現

<sup>72</sup> 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錄全集》，冊42，頁164-165。

<sup>73</sup> 洪大容、李德懋著，鄭健行點校，《乾淨衙筆談·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39。

<sup>74</sup> 洪大容與江西儒生周應文交談時，周應文就把大明衣冠認作「箕子遺制」，見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錄全集》，冊42，頁33。

清代朝鮮人文化認同之深固，也道出清代士人對於「明朝」的陌生。<sup>75</sup>

朝鮮人對衣冠的情感並不特別，明遺民關於衣冠的討論與堅持一直是成為「遺民」的要素之一。<sup>76</sup>更重要的是，經由朝鮮使節的見聞及著述，不少遺民故事得以流傳。<sup>77</sup>故此，朝鮮人特意刺探中國士人對於明朝故事的反應，以及不經意地談論「大明衣冠」不僅是一種「自我述說」，同時也冀望「中國人」的思漢之心。葛兆光、夫馬進與孫衛國的研究或著眼於「朝鮮」對於明清鼎革的「反應」，但從明清史的角度觀之，朝鮮使節在中國的記述主角明顯是以中國人為中心的參照。一個來自乾隆中葉的例子適足以說明此點，李埤（1737-1795）的《聞見雜記》中特別提及：

清人冠服，渠輩自視歉然，我人亦笑之，……，每與渠輩語，問其衣服之制，則漢人輒赧然有慙色。問我人服色，或云此是中華之制，非不知可喜。吾輩時王之法，亦多好處。詰其所以，則頭髮盡剃，無梳櫛之勞，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別，制度簡易，執事服役，無所相礙，以此為便。有識者或曰：「此吾先祖之所服，我家尚藏舊衣，以時披玩，子服之華制，寧不歆艷云。」而亦為之愴然矣。然至於明時團領及華冠等物，皆歸於戲子堂，殆無舊制。大抵元氏雖入帝中國，天下猶未剃髮，今則四海之內，皆是胡服。百年陸沉，中華文物，蕩然無餘。<sup>78</sup>

<sup>75</sup> 洪大容與兩位翰林相會時，注意到他們「觀良久不去」，第一次短暫的會面後，洪大容將此事視為「念兩人雖屈身胡庭，喜見我輩衣冠，必有所由也。」見洪大容，《湛軒燕記》，《燕行錄全集》，冊42，頁15。

<sup>76</sup> 相關討論見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0（臺北，2002.6），頁39-56。

<sup>77</sup> 例如著名的朝鮮士大夫成海應（1760-1839）就編輯《皇明遺民傳》，存明遺民之史事。《皇明遺民傳》自民初以來，作者一直沒有確論，僅屬名「佚名朝鮮人」，經孫衛國考察，方廓清此事，見氏著，〈朝鮮《皇明遺民傳》的作者及其成書〉，《漢學研究》，20：1（臺北，2002.6），頁163-188。

<sup>78</sup>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下冊（首爾：成均館大學，1962），頁644。

時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坤的中國見聞不啻是補充明遺民研究的重要材料。部分清人對於身著「胡服」仍顯得「赧然有慙色」，儘管竭力陳述剃頭之便，號稱「上下均服，無名分之別」，但朝鮮人在中國仍發覺有識者坦承「我家尙藏舊衣」。朝鮮使節在清朝尋覓「明朝故事」，李坤仍言「或有節義旌門，不請於朝者。或有只稱康熙、雍正，而不稱皇上者。」<sup>79</sup>為我們從域外研究遺民指引另一路徑。

### （三）文化交流與書籍史的匯流

相較之下，關於中朝書籍傳播的研究仍處於起步階段，若干成果尙未形成論述，且多集中於琉璃廠或基礎性的介紹。《燕行錄》保存了許多中國史料，書籍自然包括其中，藉由域外漢文文獻探索古籍在明清中國的流傳，擴充史料做為明清史研究之資進行個案研究，仍是未來不可忽視的發展方面。不過，中朝書籍史相較其他東亞各國如日本、琉球、越南，更有處理書籍流動、閱讀情形的優勢。日本學者大庭脩（1927-2002）的研究指出龐大漢籍東傳日本，並影響了不少日本士人與領主，<sup>80</sup>南京大學范金民則著力於清代江南書籍的輸出，<sup>81</sup>皆為吾人勾勒出漢籍東傳日本的狀況。一個值得參考的個案是臺灣大學衣若蘭關於《讀史管見》的研究，一位不著名的清代廣東女史李晚芳（1692-1767），她將閱讀《史記》的若干心得整理成《讀史管見》刊行，此書在日本流行，甚至有「和刻本」的出現，可見海外讀者對此書充滿興趣。<sup>82</sup>《讀史管見》在日本的流傳及和刻本的出現，揭示海外讀者對中

<sup>79</sup>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下冊，頁666。

<sup>80</sup>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中譯本見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作者整理的「賚來書目」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見氏著，《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

<sup>81</sup> 范金民，〈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2010：1（上海，2010.2），頁75-88。

<sup>82</sup>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第9屆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50周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二》（臺北：輔仁大學，2013），頁1-24。

國書籍的接受與改編，中國文本進入他者的知識空間中。在中朝關係史研究方面，孫衛國雖注意到中國史書東傳所造成的影響，但文化交流與書籍史似乎仍未有緊密接軌之處。夫馬進曾提及洪大容與中國儒生唱酬的《乾淨衙筆談》在朝鮮所造成的影響，但除此之外就不見關於以書籍為中心的討論。<sup>83</sup>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朝鮮時代書目叢刊》<sup>84</sup>的出版為我們提供考察中國書目流傳的機會，同時《韓國文集叢刊》、《朝鮮王朝實錄》以及《燕行錄》陸續完成數位化的工程，也為考索漢籍流向節省時力。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中朝之間的醫籍交流，從《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的子部類即可知之，中國大量的醫書流入朝鮮。燕行使在北京特別留意各種醫籍，使節團中更有醫員負責購買藥品、醫治團員，更有趣的是，不少貢道沿路的中國百姓、官員「攔使求醫」，如趙憲、許筠的《燕行錄》及《使臣別單》中皆不乏自己求診或沿途百姓求醫的記載。醫療或許是結合文化交流、《燕行錄》與書籍傳播的一個樞紐，<sup>85</sup>倘若有所謂「東亞書籍史」，則醫療不僅是聯絡三者的中心，應該也是一個明清史學界擅場的議題。

#### （四）從「明清」思考「中朝」的意義及未來

中朝關係史研究的新面向在於議題的推陳出新，但從中國史

<sup>83</sup> 李元淳曾整理宋至清代中朝圖書交流諸多重要案例，見氏著，〈朝中圖書交流瞥見〉，《韓國研究論叢》，3（上海，1997），頁245-272。另外，周振鶴將1800-1915年間的出版品稱為「近代文獻」，指出學界對這些材料缺乏全面性的整理與研究。筆者認為16-19世紀300年間關於書籍的研究，或為關注中國本土的「明清書籍史」，或為來往東亞各國間的「域外漢籍研究」，兩者如何對話，從「前近代文獻」的角度定位這段期間圖書性質、流通、內容的特殊性，則是未來值得考察之處，亦是中朝書籍史的意義。相關討論見周振鶴，〈印刷出版史上的近代文獻述略〉，收入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等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1-18。

<sup>84</sup> 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

<sup>85</sup> 如日本茨城大學真柳誠對東亞醫籍的傳播與考訂工作，值得注意，見氏著，〈日本江戶時期傳入的中國醫書及其和刻〉，《中國科技史料》，23：3（北京，2002.9），頁232-254；〈中日韓越古醫籍數據的比較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31：3（北京，2010.9），頁243-256。

的立場出發，「越界窺察」<sup>86</sup>的理解則為我們發現明清史的「新角落」。從明清史探索而得的新角落有二，其一是擴充史料以補中國史料之不足，其二則是藉由朝鮮記述作為參照，深入過去不曾討論的面向。首先，就擴充史料而言，域外漢文文獻，尤其是《燕行錄》提供諸多重要的記載，除上述的研究已呈現此點外，明清史學者如范金民、人民大學王政堯皆曾以《燕行錄》中的若干材料重現中國史的風景。<sup>87</sup>范金民利用崔溥《漂海錄》關於運河的記載，配合沿路各地的地方志與明代制度分析，企圖「賦予崔溥及其《漂海錄》恰當的地位」，實際上正是將《漂海錄》作為中國史研究的材料。

其次，將中朝關係史作為文史研究的新視野。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立之初確立幾個發展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從周邊看中國」，也就是推廣中外關係研究，因此不僅出版史料、召開會議，甚至整理不少專著。葛兆光曾以〈預流、立場與方法——追尋文史研究的新視野〉為題，論述「從周邊看中國」的旨趣。要言之，「從周邊看中國」雖發展中外關係，但仍然是聚焦於中國史的，這並非要重拾過往學術界對滿、蒙、回、藏等等的學術興趣，而是重建以周邊國家為他者的新參照系統，來認識歷史意義上的文化中國。<sup>88</sup>葛氏的論點旨在探索一個從東亞各國審視中國的系統，藉由這些與中國同質性較高的「鄰居」，我們得以更細膩地體察中國的特色。相較於上個世紀喜以「西方—東方」的強烈對比凸顯雙方的差異，借用此種參照方式如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記述，更能體現中國文化的歷史意義。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燕行使關於中國風俗的記載，朝鮮人熟習

<sup>86</sup> 此為黃仁宇提倡從更深遠的視角審視明代史時所說，旨在將明史置於近代史的範疇中看待，見氏著，〈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73。

<sup>87</sup> 王政堯，《清史述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范金民，〈朝鮮人眼中的中國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歷史地理》，20（上海，2004.10），頁21-60。此外，范金民也注意到1818年朝鮮人崔斗燾行經大運河的《乘槎錄》，見范金民、羅曉翔，〈朝鮮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國風情——以崔斗燾《乘槎錄》為中心〉，《史學集刊》，3（長春，2009.5），頁56-64。

<sup>88</sup> 葛兆光，〈預流、立場與方法——追尋文史研究的新視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上海，2007.4）頁1-14。

中國文化，各種禮儀一如明朝。當朝鮮使節行經貢道時，他們能夠清楚地辨析風俗差異，如北方地區「喪禮用樂」、「男女無別」、「崇佛重道」與朝鮮國內的不同，而此類細微的「異」並非西方傳教士所能體察的。<sup>89</sup>究其實，深入中朝關係史研究，實是從另一面向觀察明清社會史的途徑，提供明清史尋找「新視野」的可能。例如治中朝關係史的學者皆知朝鮮士人在明亡後為神宗皇帝哀悼，朝鮮王室甚至於禁中建立「大報壇」以崇祀之，緬懷萬曆帝的各種言說，即是明亡的表徵。不過，相較於明遺民屢屢述說崇禎帝的功業，而將明之亡追溯於「神廟、世廟」之際，顯有不同。朝鮮使節於清初頻頻刺探中國儒生是否「思明」，即是藉由各種關於「前明君王」的話題而起，中國、朝鮮在清代各自對明朝帝王的論述，究竟是起於清代官方統治術的影響，抑或是國情不同導致的差異，正須從明清史的視野重新理解。

另一個有待發展的方向則是明清法制史、邊疆史。朝鮮官方一律按《大明律》<sup>90</sup>行事，即使成為清朝藩屬後也遵行不違。但是，姑不論《大明律》在明代朝鮮已沿用兩百年，入清後與朝鮮社會的隔閡更為明顯，對於《大明律》的修改、適用性其實一直是朝鮮士大夫關心所在。南京大學張春海考察清代朝鮮對《大明律》的討論，他發現雖然《大明律》的效力在入清以後下降，但隨著朝鮮官方尊周思明的立場愈明確，《大明律》的地位也愈穩固。同時，《大明律》更是朝鮮官員案上必備之書，需時時翻閱，顯見其重要性。<sup>91</sup>此外，朝鮮與清朝比鄰而居，時常有百姓「非法越界」，甚至是越界走私、犯罪，引起兩國關注。中國社科院的李花子考察清朝從入關前到同治年間對於朝鮮人越境問題的處置方法，指出清朝、朝鮮雙方雖逐步嚴加管制，但仍存在大規模的移

<sup>89</sup> 葛兆光，〈攬鏡自鑑——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上海，2008.4），頁2-9。

<sup>90</sup> 朝鮮重要的官修制書《經國大典》載：「用律，用《大明律》。」見《經國大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頁483。

<sup>91</sup> 張春海，〈試論朝鮮王朝後期《大明律》之地位〉，《韓國學論文集》，19（廣州，2011.4），頁61-73。

墾、移民、犯罪問題。<sup>92</sup>明清法制史的學者，似乎尙未注意《大明律》在鄰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與困擾，而清代東北的越界問題，也不見中文學界討論。遺憾的是，張春海的研究未能吸收近來臺灣學界關於《大明律》的發現，尤其是同樣宣稱繼承《大明律》的清朝與朝鮮之間是否面對相同的歷史難題，相關比較性的研究尙付闕如。李花子的專著也僅以《朝鮮王朝實錄》等官方文獻爲主，沒有利用到諸如《軍機檔》、《內閣大庫檔》的珍貴史料，<sup>93</sup>而這正是吾人值得著墨之處。

綜上所述，近來的研究成果改變了過往中朝關係的刻板印象，而中朝關係史研究亦從側面照亮不少過往明清史忽略的圖像。《燕行錄》與域外漢籍等漢文文獻不僅擴充中國史料的範疇，也爲我們拓展新的視野，諸如中國士人的日常生活、清代禁書的隱蔽與浮動、書籍傳播與文化交流的結合、《大明律》在東亞的定位與東北越界的制度性考察，皆是未來值得開拓的議題。

#### 四、結 語

2012 年 8 月，韓國東國大學的燕行學研究所邀請中、日、韓三國學者，召開一場名爲「東亞的疏通與交流」(동아시아의 소통과 교류)的國際學術會議。以《燕行錄》研究著名的韓國學者崔韶子(최소자)<sup>94</sup>指出，直到今日，韓國學界關於《燕行錄》的研究仍以文學爲多，且較歷史研究更爲出色。她的論文以「作爲歷史資料的燕行錄」爲題，即是向韓國學界推廣《燕行錄》重要的歷史價值。她認爲《燕行錄》足以補充「壬辰倭亂」、「滿洲入關前期」、「朝貢制度」等議題之不足。<sup>95</sup>觀諸崔氏的倡言，實是盼望韓國史

<sup>92</sup>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爲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

<sup>93</sup> 筆者發現關於越界的清代檔案不少，如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106925、106926。

<sup>94</sup> 1983 年，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於中央研究院召開的「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 960-1949」，崔韶子即與會並發表論文，其後長期於梨花女子大學任教席，並以名譽教授退休。

<sup>95</sup> 최소자, 〈歷史資料로서의 燕行錄〉, 「2012 년 동아시아의 소통과 교류 국제학술대회」, 頁 35-64。事實上，崔韶子於 2008 年就曾指出這個現象，她認爲《燕行錄》於韓國

學界能夠更關心《燕行錄》，作為探討中朝關係、朝鮮史的重要依據。

反思崔韶子對《燕行錄》研究提出的建言，與葛兆光、王振忠、夫馬進等人的觀點可謂如出一轍。葛氏曾設問「僅僅靠中國史料來解釋中國，是否就已經足夠？」審視《燕行錄全集》及《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的篇幅，即達5萬頁之巨，且「基本上是明清兩代朝鮮人對於中國的觀察和記錄」。<sup>96</sup>這些珍貴的材料不僅是崔韶子口中補充壬辰倭亂等時期的參據，同時也是考察明清城市史、社會文化史、士人生活史、書籍史、明遺民研究的有效路徑。<sup>97</sup>

《燕行錄》與域外漢籍等漢文文獻堪稱是「東方一大寶庫」，其間仍存在不少問題，有待來者逐一釐訂。夫馬進的研究提醒了《燕行錄》中可能出現的「加工」或「造假」問題，因此《燕行錄》作為歷史材料引用的時候應該保持充分的警覺性，且應對史料本身進行研究。夫馬進於2008年的觀察仍是「關於《燕行錄》的基礎研究，到目前為止尚不存在。相反的卻充斥著謬誤百出的書目提要，研究者在這種情況下無法將研究推向深入。」<sup>98</sup>近來如

---

學界尚未受到普遍的關注，有待《燕行錄》研究的議題更體系化、擴大研究對象、跨學科對話。見최소자, 〈“燕行錄”연구를위한제언〉(對燕行錄研究的建言), 《명칭사연구》(明清史研究), 30(首爾, 2008), 頁1-11。另一個足以證明的例子即是2006年出版十冊的《燕行錄研究叢書》(연행록연구총서)中, 5本屬「文」, 只有一本是「歷史」, 見조규익외4명엮음, 《연행록연구총서》(서울서울: 신국관, 2006)。

<sup>96</sup> 葛兆光, 〈攬鏡自鑑——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 頁2-9。值得一提的是, 對於清史領域的研究者而言, 朝鮮史料並不陌生。事實上, 自著名的清史大家孟森以降, 尤其是關注「清前期」研究的學者, 早已意識到僅倚靠中國史料治清史之不足。

<sup>97</sup> 此外, 藉《燕行錄》考察清朝衰退期(The Decline of Qing Dynasty)亦是未來值得發展的方向, 囿於篇幅, 本文未深入論及道光以降的研究情況, 但如李慶淳(1803-?)《夢經堂日史》中關於清晚期政治、社會豐富的記載, 或是未來相關研究不可忽視的史料。見《夢經堂日史》, 《燕行錄全集》, 94冊。

<sup>98</sup> 夫馬進著, 伍躍譯, 〈關於日本現存《燕行錄》的文獻整理〉, 《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 3:3(臺北, 2008.9), 頁19。亦見於夫馬進, 《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 頁197。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出版的《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sup>99</sup>已提供簡要的題解、作者介紹，儘管數量仍難以企及《燕行錄全集》所收錄的範圍，但基礎研究確已逐步展開了。<sup>100</sup>展望未來，中朝關係史研究如何憑藉著寶庫中豐富的收藏，挖掘明清史的新面向，實需進行一定程度的史料研究。如以一部部《燕行錄》為中心的題解或許是值得嘗試的辦法，而關於這上萬頁漢文史料的基礎研究與新議題的開發，則有待明清史學界從不同的視角進入這塊尚待開闢的園地。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2 輯，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朝鮮王朝實錄》，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1973。

《經國大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7。

王鍾翰輯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女真史料選編》，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9。

池內宏編，《明代滿蒙史料：李朝實錄抄》，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

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 1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 2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弘華文主編，《燕行錄全編》第 3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所編，《燕行錄選集·補遺》，首爾：東國大學，2008。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編，《燕行錄選集》，首爾：成均館大學，1962。

吳 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

<sup>99</sup>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sup>100</sup> 關於《燕行錄》的版本以及收錄範圍、考訂上的討論，另見漆永祥，〈關於《燕行錄全集》之輯補與新編〉，《文獻》，2012：4（北京，2012.12），頁149-157。

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清代史料》，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林基中、夫馬進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2001。

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首爾：東國大學，2001。

林基中編，《燕行錄續集》，首爾：尚書院，2008。

洪大容、李德懋著，鄭健行點校，《乾淨術筆談·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殷夢霞、于浩選編，《使朝鮮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合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趙季輯校，《足本皇華集》，北京：鳳凰出版社，2013。

## 二、近人著作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67。

夫馬進著，伍躍譯，《朝鮮燕行使與朝鮮通信使：使節視野中的中國·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

王政堯，《清史述得》，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

朱雲影，《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李花子，《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

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

杜慧月，《明代文臣出使朝鮮與《皇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孫衛國，《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徐東日，《朝鮮朝使臣眼中的中國形象——以《燕行錄》《朝天錄》為中心》，北京：中華書局，2010。

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 1637-189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

葉泉宏，《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1。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12。

謝國禎，《明清史談叢》，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

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等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조규익 외 4 명 엮음，《연행록연구총서》，서울：신국관，2006。

### 三、近人論文

夫馬進著、伍躍譯，〈關於日本現存《燕行錄》的文獻整理〉，《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訊》，3：3（臺北，2008.9），頁15-20。

王汎森輯，〈史語所藏胡適與傅斯年來往函札〉，《大陸雜誌》，93：3（臺北，1996.9），頁1-23。

王禹浪、程功、劉加明，〈近二十年中國《燕行錄》研究綜述〉，《哈爾濱學院學報》，33：11（哈爾濱，2012.11），頁1-12。

王振忠，〈18世紀東亞海域國際交流中的風俗紀錄——兼論日、朝盛清時代中國的重新定位及其社會反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合肥，2010.8），頁1-16。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18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上）〉，《韓國研究論叢》，22（上海，2010.12），頁60-85。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所見18世紀之盛清社會——以李德懋的《入燕記》為例（下）〉，《韓國研究論叢》，24（上海，2012.8），頁340-357。

王振忠，〈朝鮮燕行使者與18世紀北京的琉璃廠〉，《安徽史學》，2011：5（合肥，2011.9），頁13-29、116。

甘懷真，〈從儒學在東亞到東亞儒學：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省思〉，《東亞觀念史集刊》，1（臺北，2011.12），頁381-400。

朱鴻林，〈《王文成公全書》刊行與王陽明從祀爭議的意義〉，收入楊聯陞、全漢昇、劉廣京主編，《國史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祝壽論文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88，下冊，頁567-581。

衣若芬，〈禮樂與女色：明代出使朝鮮文臣的「卻妓詩」及其影響〉，《域外漢籍研究集刊》，6，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91-113。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第9屆

- 文化交流史暨輔大歷史學系在台 50 周年：傳承與涵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二》，臺北：輔仁大學，2013，頁1-24。
- 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董作賓等著，《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1955，頁151-185。
- 李元淳，〈朝中圖書交流瞥見〉，《韓國研究論叢》，3（上海，1997），頁245-272。
- 李新峰，〈明前期赴朝鮮使臣叢考〉，《明清論叢》，4，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91-104。
- 沈玉慧，〈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朝鮮使節與安南、南掌、琉球三國人員於北京之交流〉，《臺大歷史學報》，50（臺北，2012.12），頁109-153。
- 沈玉慧，〈清代朝鮮使節在北京的琉球情報收集〉，《漢學研究》，29：3（臺北，2011.9），頁155-190。
- 林基中著、王永一譯，〈《燕行錄》的傳承〉，《中國邊政》，180（臺北，2009.12），頁27-38。
- 林麗月，〈故國衣冠：鼎革易服與明清之際的遺民心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0（臺北，2002.6），頁39-56。
- 河惠丁，〈韓國漢學文獻收藏及資料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30：2（臺北，2011.5），頁31-39。
- 范金民，〈朝鮮人眼中的中國運河風情——以崔溥《漂海錄》為中心〉，《歷史地理》，20（上海，2004.10），頁21-60。
- 范金民，〈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2010：1（上海，2010.2），頁75-88。
- 范金民、羅曉翔，〈朝鮮人眼中的清中期中國風情——以崔斗灿《乘槎錄》為中心〉，《史學集刊》，2009：5（長春，2009.5），頁56-64。
- 孫衛國，〈《朝天錄》與《燕行錄》——朝鮮使臣的中國使行紀錄〉，《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1（北京，2002.3），頁74-80。
- 孫衛國，〈朝鮮《皇明遺民傳》的作者及其成書〉，《漢學研究》，20：1（臺北，2002.6），頁163-188。
- 孫衛國，〈朝鮮王朝關王廟創建本末與關王崇拜之演變〉，《東疆學刊》，27：2（延吉，2010.4），頁1-13。
- 真柳誠，〈中日韓越古醫籍數據的比較研究〉，《中國科技史雜誌》，31：3（北京，2010.9），頁243-256。
- 真柳誠，〈日本江戶時期傳入的中國醫書及其和刻〉，《中國科技史料》，23：3（北京，2002.9），頁232-254。

- 崔溶澈，〈韓國所藏明代小說的概況及其特徵〉，《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2011，頁277-286。
- 張升，〈朝鮮文獻與四庫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2007：1（成都，2007.2），頁182-189。
-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4：5（臺北，1967.1），頁41-42。
- 張存武，〈清代中國對朝鮮文化之影響〉，《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頁304-381。
- 張春海，〈試論朝鮮王朝後期《大明律》之地位〉，《韓國學論文集》，19（北京，2010.4），頁61-73。
- 張崑將，〈十六世紀末中韓使節關於陽明學的論辯及其意義——以許筠與袁黃爲中心〉，《台大文史哲學報》，70（臺北，2009.5），頁55-84。
- 曹婷婷，〈《皇華集》——中朝文化交往的歷史見證〉，《韓國學論文集》，12（北京，2004），頁25-40。
- 陳尙勝，〈近 16 年來中國學術界關於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述評〉，《當代韓國》，2009：3（北京，2009.9），頁80-92。
- 陸小燕、葉少飛，〈萬曆二十五年朝鮮安南使臣詩文問答析論〉，《域外漢籍研究集刊》，9，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95-420。
- 馮爾康，〈朝鮮大報壇述論——中朝關係和中國文化傳播的一個側面研究〉，《韓國學報》，10（臺北，1991.5），頁121-143。
- 黃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放寬歷史的視界》，臺北：允晨文化，1999，頁72-99。
- 黃普基，〈從「遼燕舊界」到「華夷大界」——朝鮮人筆下的山海關意象〉，《清史研究》，2012：4（北京，2012.11），頁28-36。
- 葛兆光，〈「不意於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像〉，《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1（北京，2010.1），頁84-92。
-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10（開封，2005.10），頁41-48。
-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81（上海，2006.3），頁29-58。
- 葛兆光，〈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中國典籍與文化》，2012：1（北京，2012.3），頁8-22。
- 葛兆光，〈朝貢、禮儀與衣冠——從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國王熱河祝壽及請改

- 易服色說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上海，2012.4），頁1-11。
- 葛兆光，〈想像異域悲情——朝鮮使者關於季文蘭題詩的兩百年遐想〉，《中國文化》，22（北京，2006.5），頁138-145。
- 葛兆光，〈預流、立場與方法——追尋文史研究的新視野〉，《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2（上海，2007.4），頁1-14。
- 葛兆光，〈鄰居家裡的陌生人——清中葉朝鮮使者眼中北京的西洋傳教士〉，《中國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北京，2006.6），頁1-11。
- 葛兆光，〈攬鏡自鑑——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上海，2008.4），頁2-9。
- 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藩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29：2（臺北，2011.6），頁53-80。
-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全集》之輯補與新編〉，《文獻》，2012：4（北京，2012.12），頁149-157。
- 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臺北，2009.6），頁219-255。
- 裴英姬，〈十八世紀中朝文物品交流及其中國觀感：以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 羅樂然，〈乾隆禁教期的耶穌會士在華活動——以劉松齡為研究中心〉，《中國史研究》，82（大邱，2013.2），頁93-114。
- 羅樂然，〈清代朝鮮人西洋觀的形成——以洪大容燕行為研究中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10：1（臺北，2013.6），頁299-345。
- 譚妮如，〈李基憲《燕行錄》中之清代中國形象〉，《漢學研究集刊》，12（雲林，2011.6），頁133-164。
- 최소자，〈“燕行錄”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칭사연구》，30（首爾，2008），頁1-11。
- 최소자，〈歷史資料로서의 燕行錄〉，「2012년 동아시아의 소통과 교류 국제학술대회」，頁35-64。
- JaHyun Kim Haboush. “Contesting Chinese Time, Nationalizing Temporal Space: Temporal Inscription in Late Korea.” Struve, Lynn A.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s Press, 2005, pp. 115-141.

## **Discovering Ming-Qing History through Sino-Choson Studies: Focus on China Mission Record, 2000-2013**

Wu, Cheng-wei\*

### Abstract

So far the study of Sino-Choson Studies has been strangely neglected by Ming-Qing history researche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studies and digital engineering have been made on Sino-Choson history. Although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made on Sino-Choson studies, little is known about how it could influence the studies of Ming-Qing histor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as an introduction of Sino-Choson studies and explored its future possibility in Ming-Qing studies. An exhaustive inspect of recent research achievement is not necessary in this article. This investigation would like to focus 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ua-Yi distinction”, and “Books Currency”. The purpose here is to explore a little further between “Ming-Qing” and “Sino-Choson” by these three issues. Taking a focus on recent survey on China Mission Record, the issues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s taken some important steps in this direction. The researcher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from “national diplomacy” to “literati intercourse”, and went deep into more complicated mentality of Sino-Choson literati. On the one hand, I will inspect the result of Sino-Choson studies since 2000, on the other hand reflection on some of these will make clear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Sino-Choson studies in Ming-Qing history.

**Keywords:** Sino-Choson History, Ming-Qing Studies, Yŏnhaengnok Yeon Rok Mission Recor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history,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

\*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